

童明：《现代性赋格：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228页。

TONG Ming. *Modernity in Fugue: Revelations of the 19th Century European Literature*. Guilin: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, 2008, 228 pp.*

《现代性赋格》出版之后颇有读者缘，我看到修订本在2019年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的大众推荐排行榜上得票甚高。作者识见通透，笔法潇洒，写出来的东西使人可以细细咬嚼（不少理论类的书让人吞也吞不下嚼也嚼不动），故而理所当然得到读者的喜爱。这倒不是说它是一本通俗读物。《现代性赋格》是学院派作品，阐述欧洲近代的哲学和文学，所处理的问题和对象——不管是理论概念还是文本细节都是蛮复杂的。作者童明先生以其多年研究和教学积累撰成此书，他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态度举轻若重而行文举重若轻，深心眷注，娓娓道来，间以絮语和咏叹的杂文笔法，文风不同于通常所见的外国文学批评著作，读者会感到是在和一位文人趣味的学者对话，和他一起漫步、思考、吟咏。

然而，这场漫步不会轻松。“现代性”是如此宏大的令人难以把握的题目，要界定其讨论的范围就颇费一番工夫，而关于“现代性”的哲学和神学的批判，已然甚嚣尘上，如果想要吟咏也是一曲必须加大嗓门的忧郁的咏叹调了。总之，不容易论述。看一下“现代性赋格”这个书名，似在暗示某种音乐性的灵感，但只有通读全书我们才会对题意有所领会。

“赋格”者，复调音乐体裁之谓也。这种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体裁，强调主题和“对题”之间的对位关系，童明先生以此术语命名他的著作，并不是要将标题修饰得漂亮一些，而是有明确的立意，即此书包含着“对体系现代性做出应答的其他现代性观点”，颇类似于主题和对题的对位关系的演绎，因此，就其立意和结构而言，标题亦可写作“体系现代性和作为其应答的现代性观点”。这样改写一下，就成了一个标

* 投稿日期 Submitted Date: Oct. 15, 2020; 接受刊登日期 Accepted Date: Nov. 15, 2020.

准的学院派论著的标题了。事实上也是,此书是通过当代批评理论和19世纪经典文学作品来探讨启蒙现代性的论题,其概念的辨析、文献的引用和论证的方法都是按照学术规范做的。除了文风鱼鱼雅雅自成一格,很难将它归类到其他读物中去。作为一部论著,它的立意和结构互为表里,颇值得关注。

首先,关于“现代性”的议题,它既是一个学术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;尤其是对我们来说,有关该论题的基本立场恐怕也会成为一种争议,因此从现实情境上讲可能会格外关心。童明先生的写作的出发点兼具二者,一方面要梳理体系现代性以降的观念史的脉络,从康德到福柯,叩问“什么是启蒙?”这一核心问题,一方面要审视现实情境中滋生的阴云疑团,瞩目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表现。虽是学院高头讲章,实乃寄托忧患之作。童明先生的意思是,作为后进国家,在接受“现代性”时不能摸着石头过河,而是要有清醒的应对。他已经跳出费正清和苏珊·桑塔格的争论范围。费正清为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辩护,认为东亚社会的集体主义传统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,因此必须从东亚文化自身的特质来考虑和选择。苏珊·桑塔格并不赞同这种看法;她争辩说,我们都生活在就其传统而言已经断裂的“现代性”里。换言之,“现代性”对传统西方来说也是陌生的;实质是都谈不上有选择。童明先生也许会说,既来之则安之,但不应该像是掉了魂儿似的,哪一边都挨不着;“如果启蒙是人类精神的悟知,启蒙就要一直继续”。这是此书的基本立场。因此,以“法兰西篇”和“俄罗斯篇”为阐释对象,并非择优录取,而是从发达和不发达的状况考察现代性的典型表现,这是它在架构上的用心,有一以贯之的逻辑。

其次,童明先生对国内研究中流行的一些说法提出异议,例如将现代和后现代截然对立,他认为值得商榷。确实,我们平时的教学和研究中会把后现代性视为对现代性的终结,认为它们分属不同的理论和历史阶段。童明先生在此书的修订版序中专门做了一番辨析和说明:后现代的“后”不单是时序的概念,在他的理解中也是指“后见之明”的“后”;后现代是一个伞形概念,汇集了许多种解构和思辨的策略,这是几百年的思辨累积的结果,因此谈到这两个概念,强调断裂不如强调延续来的恰当;那种认为“我们连现代性都还没解决好呢,谈什么后现代”的说法貌似有理,实质是不可取的;且不说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是一种误解,将后现代批评理论弃置一旁而不知汲取,无助于我们为学的目的;我们为学的目的是什么呢?答曰,“自主的思辨”;他认为这是最要紧的。童明先生的这番概念辨析,阐释了写作的宗旨,廓清了学理上的某些误解,读来很有启发,我以为是此书颇可瞩目的一大亮点。

当然,读者(包括作者)比较看重的恐怕还是作品分析。谈波德莱尔,谈《包法利夫人》,谈《地下室手记》,等等,更多展示论者诗性的眼光。以波德莱尔为例,国内的论著或文章像这样谈论的不多,或者说我还没有看到。描画“忧郁”的波德莱尔,很容易将他描黑了。不作拔高而能刻画出波德莱尔的“正大仙容”,十分不易。

此书副标题是“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”,重点自然落在了和“启蒙现代性”相关的“启示”上。也就是说,细节分析虽不拘于框架的限制,论述却还是有一个清晰的导向。一般说来,美学散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多空间的;童明先生却每每从美学的端口入手,对作

家作品别有一番体恤；话里话外，出入自如；借助人文广角镜头，作名著的纵横谈。我想，读者喜欢的该是他那一份丝丝入扣的从容，是他那种睿智而带有体温的感悟吧。

读者喜欢与否未必能成为重要标准，但是文学批评中的“文学”二字该如何置放，确实需要考量。我读童明先生这本书，既有学理上的许多收获，也能从其文学涵养和谈吐的方式中得到享受。作为论著它依靠理性的方法，但它显然不同于当代学院诡辩师(sophist)之作。我倒不是说要把文学批评往精神哲学的方向推进，要求概念(名相)必须是象征的，认知一定是直觉的，语言应该是诗化的。但这本书确实让我感受到一些有趣的迹象和召唤。

许志强，浙江大学

XU Zhiqiang Zhejiang University

✉ 3453599536@qq.com